

主 编 王毓铨
 副主编 刘重日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毓铨※ 刘重日※
 李 洵 李文治
 张显清※ 张海鹏
 张德信※ 南炳文※
 赵国华※ 唐文基※
 樊树志
 ※为常务编委

明 史 研 究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6 字数:4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1000

ISBN7-80535-873-7/K·473

定价:25.00元

明史研究

(第4辑)

目 录

编者的话 本刊编辑部 (1)

严嵩传序 王毓铨 (2)

重读《荣菴集》——为王毓铨先生85岁寿辰而作 白寿彝 (3)

王毓铨先生与钱币学 李学勤 (4)

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
 ——记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 张显清 (6)

曾经沧海难为水
 ——祝贺王毓铨先生85华诞暨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 张宪博 (9)

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
 ——明清徽商与两淮盐业研究之二 张海鹏 (15)

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明代商税研究之一 李龙潜 (25)

明代中央织染机构考述 范金民 夏维中 (44)

论明代的吏 李 洵 (51)

明代州县官更恶处规制刍议 柏 桦 (60)

论明代教官地位的卑下及其影响 郭培贵 (68)

论明之移都北京 [美] 范 德 (78)

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 万 明 (83)

明后期分权共政论的发展 [韩] 曹永禄 (97)

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 陈梧桐 (104)

天启时东林党人失败的教训 韩大成 (112)

黄毓祺的复明活动和黄毓祺案 何龄修 (124)

明宣宗《五伦书》中对明太祖之评价 [香港] 赵令扬 (131)

略论宋濂的理学思想和文学主张 沙似雪 (137)

张居正治国方略的整体思想 吴量恺 (140)

正直博学的焦澹园 南炳文 (148)

明太祖对道教的态度及其对三教合一的追求 [香港] 马楚坚 (157)

◆ 明人审美风尚概观 罗筠筠 (167)

明代的家庭: 家庭形态、权力角度成员间的关系 [台湾] 徐 泓 (179)

得妻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 赵 毅 赵铁峰 (197)

晚明文化商品化与社会纵欲思潮 商 传 (207)

郑经的诗集和诗歌 [台湾] 朱鸿林 (212)

天花、商贾和白莲教 [美] 卡尼·T·费什著 张宪博译 (231)

郑经的诗集和诗歌

朱鸿林

本文旨在介绍一份南明史研究及台湾史研究上最新发现的完整原始资料——明郑第二代领袖、郑成功嗣子郑经的诗集《东壁楼集》——和利用它来探讨一些有关郑经（1642—1681）这个历史人物一段长达十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上的问题。史料的正确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所致，对于传世的清抄本《延平二王遗集》中郑经名下的十二首诗歌，也连带略作考析。文字的重心不在于郑经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评赏，而在于藉诗考史，提示一些没有独立传记传世的郑经所为人不知不论的面相。

《东壁楼集》及其作者等的考订

《东壁楼集》刊于1674年（甲寅、明永历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极有可能刊于泉州。清初以降中国的各种公私藏书目录均不曾见载。此书原本今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编列番号为“汉书16875，函号为“16—5”。以我所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均藏有影印本。但郑经的名字在本书和藏书目录中均未出现。为了使这份沉埋了三百多年的重要文献得以确定所属，以下拟先对此书的外表和作者问题有所述析。

《东壁楼集》为木刻本，全书共八卷，分装三册；各册首页右上角均钤“秘阁图书之章”阳纹方印。书前有〈自序〉一篇，无跋尾；每卷之前均冠目录，页码自为起讫。目录及正文均开卷题《东壁楼集》及卷次，正文每卷书名下均题“潜苑主人东集”六字。全书连序均半页左右边双栏，上下单栏；序文及目录版面一行十八字，目录行上空二格，正文行不空。板心上口序文部份刻“东壁楼序”；余作“东壁楼集”四字，均其下有黑鱼尾，尾下序文部份空白，余均右边刻卷次，稍下左边刻该卷体裁如“五言古”等。每板均中缝下部中刻页码，下口右边刻“东集”二字。正文诗题均低二格；各诗句旁均有圈点；句下或并有评语，则作小字双行；诗末有总评者，例低三格。〈自序〉为行书篆刻，余文用仿宋硬体；无刻工姓字，然刀工整丽，刷印明晰，似原刻初印本无疑。

是书〈自序〉凡三页，合题目及署款共178字，及阳纹阴纹篆印各一方。诗卷以体裁区分，一体一卷。各卷诗体诗数及目录、正文页数如次：卷一、五言古88首，5+30页；卷二、七言古60首，4+26页；卷三、五言律104首，6+27页；卷四、七言律89首，6+28页；卷五、五言排律41首，3+14页；卷六、七言排律21首，2+9页；卷七、五言绝24首，2+6页；卷八、七言绝53首，4+11页。计全书连序186页（板），凡刊诗480首。各卷诗作的编法，皆以括题分韵或选韵当课而作的集中一起，放在独立命题之作之后。诗作无形中分成了两类，而每类诸作的排列，则明显是依成诗的先后为次序的。这个准编年的编法，对于了解作者的经历，还是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有分行栏，正文部份无之。序文半页五行，行十字，上空二格；正文均半页九行，

《东壁楼集》长期沉沦以至未被众多关心和研究南明史及台湾史的学者知悉和利用，^①可能的原因很多：此书是不易赐人和不售于市的王者之作；其流传本来已有先天性的限制；加上三藩之乱时期闽粤地方的战火频繁、明郑败亡后败方政治人物文字的难免摧毁、清初文字狱淫威的波及等等，遂使它变成名符其实的海内外孤本，不易为世人所经见。

至于近代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忽略错过，则恐怕与本书之未标作者原名和日本文献著录上的误断不无关系。上文已经提及，本书各卷均题撰者为“潜苑主人”，下文将加引录的〈自序〉作者也作同样署名。日本《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把这撰者定为“明朱由榔”，^②亦即南明隆武帝、原封桂王的永历帝（在位时间1646—1661或1647改元永历，1662卒）。这个订名为多数收藏此书影印本的处所的著录所沿用，但其实却是明显错误的；因为〈自序〉署“永历甲寅”，即永历二十八年（1674），而永历帝早在十二年前已在云南为吴三桂所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可能有鉴于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仍著录为“明潜苑主人撰”，^③但也无别作考订。

其实只要把〈自序〉留心的看一遍，郑经之为此书作者，便可确定，再把内文参看后，就便更加无疑了。这篇原已圈断句读的〈自序〉，文字不多，可以逐录如下：

“自序”

余自幼从师，仅记章句耳。至十余岁，方粗识大略。每读书史忠孝之事，未尝不感激思奋。缘国祚中衰，胡氛正炽，余年颇长，乃日事弓马，不务刀笔。及先王宾天，始出临戎，嗣守东宁，以图大业。但公事之余，无以自遣，或发于感慨之时，或寄于山水之前，或托于风月之下，随感吟咏。无非西方美人之恩，日者虏运将终，四方并起，余爰整大师，直抵闽疆。思恢复有期，毋负周末吟咏之意。乃命官镌刻，而名曰东集，以明己志云。

永历甲寅夏六月潜苑主人自识

式天氏（阳纹篆方）潜苑主人（阴纹篆方）

这篇自序，研究南明史的读了，马上便会知道这不可能是未曾“直抵闽疆”的永历帝朱由榔的文字；研究明郑史的读了，马上便会知道只有郑经才是它的作者。理由实在简单：“式天”正是郑经的别字，至少是他的别字之一；曾经“嗣守东宁（台湾），以图大业”，乃至“爰整大师，直抵闽疆”，以图恢复的，也只有延平王郑成功的嗣世子郑经一人；而永历甲寅（即康熙十三年）夏六月正是郑经西征初捷、入驻泉州之时。^④

这里唯一需稍澄清的，只有“式天”这个别字。连横作《台湾通史》，书郑经字为“式夫”，^⑤其后杨家骆作《延平二王遗集系年考》，亦作“式夫”。^⑥但康熙中郑成功、郑经父子归葬福建南安时，郑克塽所撰《先王父墓志》实书己“父诗经，字式天，号贤之”。^⑦后此而出的郑氏《石井本

路研究中心

① 有关的重要著作，如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61），朱希祖《朱希祖先生文集（史实考证明清篇）》（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谢国楨《增订晚明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陈三井等《郑成功全传》（台北：台湾史论丛，1979），司徒琳《南明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中译英文原著Lynn Struve，《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New Haven: Yale U. P., 1984），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等书，均未提及此集。
② 《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内阁文库，1956；改订本，1971），页370。
③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朋舍印〕，1979），页527。
④ 有关郑成功父子的编年纪事，公认可靠性高而为本文所据用的，有康熙一朝内成书的杨宾《从征实录》（台北：台湾银行，1953；台湾文献业刊第32种），阮奕梧《海上见闻录》（台北：台湾银行，1958；台湾文献业刊第27种），江日升《台湾外记》（台南：台南文化出版社，1956）等。郑经入驻泉州的时间，各书所载无异。
⑤ 连横《台湾通史》（台南：台湾通史社，1921；《连横先生全集》影印本，南投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页63（延平郡王世系表），邓孔昭《台湾通史辨误》（增订本，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此处未作辨正。
⑥ 杨家骆《延平二王遗集系年考》，《文史丛刊》第一辑（1959.6），页17—18；《延平二王遗集》（台北：世界书局，1962）卷首。
⑦ 郑克塽《先王父墓志》，见收连横《台湾诗笈杂文钞》（台北：台湾银行，1966；台湾文献业刊第224种），页17—20；引文见页18。

宗族谱》则书郑经“乳名锦，字元之，号式天”。^①“式天”二字作字或作号虽有不同，但文字却无别异。现在有了《东壁楼集·自序》末的印文和铃序为证，郑克塽所书的便为信实，郑经的别字为“式天”，决定不误。这两字当与“天经地义”或“经天纬地”之类的词义有关，大概是取“以天为式”或“取式于天”之义为文。书作“式夫”，没甚意义，应是笔误所致。不过，“贤之”或“元之”却亦未必是号；而有可能也是郑经曾有的别字，依照习惯用法，《东壁楼集》所署的“潜苑主人”，正是郑经的别号。但这个别号，看来也是有时效性的；郑经在撤退守台之前和西征入闽之后，很可能还另有别号。^②

这篇《自序》的作时——1674年夏历六月——也为我们提供了此书刻刊地点的线索。上年为康熙十二年，十一月清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反于云南，直窥湖广，开始了清史上的“三藩之乱”。次年三月，清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州反，遣官入台湾请郑经济师。郑、耿双方前此原有会师议，郑军于是出海西进，郑经本人亦于五月亲至厦门（思明州），传檄四方。六月，原降于耿藩的清朝驻守泉州武官叛变，遣官迎郑经入泉州城，为郑经的征西事业获取了首要的胜利和战略据地。^③时距郑方恢复主要的旧据地厦门只有一月。在这个充满军事行动、形势紧张而未定的月份里，郑经能在经历了明郑城破弃守和清廷沿海迁界的十年萧条之后的厦门“命官镌刻”和刷印像《东壁楼集》这般十分精美的书籍，可能性实在太小。故此此书极可能是刻印于当时商业较盛而有书刊业务存在的泉州。^④

《东壁楼集》这个书名，《自序》里没有说明；它和《自序》所说的“名曰东集”，以明居东吟咏之志的意思有一定的象征关连，但却不是同一意思。“东壁”可能只是单纯地从唐代张说《张说之集》卷五《恩制赐食于丽正书院宴》诗中的“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名句取典，由图书秘府引申为游戏艺文的场所，作为郑经文娛休憩之地的名称。郑经的“东壁”，固然还可以暗寓明郑所拥有的神州东南半壁，和此集《自序》中所称的“西方美人”所有的西南半壁，隐然对举。但从“东壁楼”这名称在诗集中出现的时间看，政治意识的寓意可能性较少，至少当郑经撤居台湾之时，南明正朔所系的永历帝及其家族已经在云南彻底消灭了。政治意味浓厚而明显的，倒是“东集”这个又名；它作为郑经东居台湾的总结代称，表征这一段生涯的结束，另一段生涯的开始；我们因此可以假设，如果郑经西入闽疆后所作诗歌还有结集的话，他很有可能用了“西集”来作诗集的又名。

总之，根据《东壁楼集》集内咏及东壁楼的五首诗作看来，无疑此楼是台湾文献上未见其名而在明郑时代确有其物的建筑，只是确实的所在地没法明定而已。有助反映东壁楼的形构、用途和所在地点的各首如下：

《东壁楼》（4/14下，七律）

高楼远峙白运边，碧海环波动碧涟。孤塔彩霞生阁阁，一江明月度渔船。朱帘斜卷昼犹日，玉槛横栊出岫烟（句下小字评：“斜卷横栊四字有致”。听政余闻觉寂寞，寄情山水墨犹疑。（总评：“秀丽”。）

《题东壁楼景自叙》（8/2上，七绝）

西郭楼台近水滨，青山白云相与邻。试问阁中谁隐者，昔日先朝一汉臣。

《东楼望》（1/3上，五古）

东阁出水滨，可望居无凭。环樵青山岸，大海云气蒸。风恬波不扬，戏潮双石鲛。远岫何葱翠（句下小字评：“转景有古意”，芳林晓烟凝。未报秋光转，已见逐鸟归。临风动远怀，击楫念澄清。

《东楼宴舞二首》之一（8/5上，七绝）

① 《石井本宗族谱》，见收《郑氏关系文书》（台北：台湾银行，1960；台湾文献业刊第69种），页23—70，引文见页42。

② 《海纪辑要》，页41—42；《台湾外记》，页217。

③ 参看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页339—40，392—93。

渺渺高楼笑语香，娇姿双舞白霓裳。一闻忽听凌云曲，宛若流泉洗醉狂。

这四首诗综合看起来，可见东壁楼颇具高度，有台阁栏槛，可助凭高远眺之兴。此楼位于城西郭外，临近水滨，矗立在碧海环绕的城墙之上。它距离郑经听政的地方不会太远，是郑经公余观眺景色，从事艺文和赏舞听曲、宴饮取乐的地方。

用明郑时代的行政地理来分析，东壁楼应即位于都城安平镇内。按：明郑的行政机关，设在郑成功定称“东都明京”的承天府，亦即荷人所筑罗民遮城，后人俗称红毛楼之地，即今日台南市赤嵌楼所在地带。藩王都城，亦即藩府以及文武官员、大小将领家属聚居之处，则在一鲲身沙岛上荷人所筑原称热兰遮城，时称台湾城，俗称红毛城而为郑成功改称安平镇之地，亦即今日台南市安平古堡所在地带。^①从上引四诗所得的反映，似乎东壁楼应在京城承天府西部、几乎四面环海的都城之上。而“孤塔彩霞生阁阁，一江明月度渔船”两句中的“孤塔”，指的应是都城所在的一鲲身岛；“一江”则正是海岸平野赤嵌地方和对岸十一个沙屿之间那“长六十多里、阔六里余，……汪洋浩瀚可泊千艘的（内港）台江”。^②至于东壁楼是否即是郑经给安平镇城楼的称谓，则只好存而不论了。

和诗集名称所本的东壁楼直接相关的另一建筑，便是郑经据作别号和用作诗集撰者名称的潜苑。“潜苑”是郑经休憩赏玩的园林，大概是取潜修藏息之意为名，与从事图书艺文游赏的“东壁”楼，隐然呼应。当然它也可以有潜邸所属苑囿的含意，郑经始终以招讨大将军嗣延平王世子自称，所以用“潜”字来表达一种自谦之意，也未尝不可。《东壁楼集》咏及潜苑的诗歌共有五首，最能描绘全体环境景物的，是这首题作《潜苑三洲》（5/6下）的文言排律：

一苑皆春色，三洲带晚风。青山接碧汉，翠洞落晴空。渔艇出丛绿，岸花到处红。远峰横落日，长渚挂残红。流水摇明月，轻烟绕岸枫。江波送远棹，霞影送归鸿。疏竹开幽径，芳林隐异宫。清幽无限景，何必羨蓬宫。（总评：“清丽洒落，何减唐人排律”。）

另外《题潜苑景》（3/1上）五律有“潜苑楼台上，巍巍接碧天”句；《再咏潜苑景一绝》（8/3下）七绝有“翠楼高耸半云天”句；《和柯仪宾侍游潜苑咏》（4/26下）七律有“小苑周围逸碧溪”句；《和柯仪宾侍游潜苑咏》（3/27上）五律有“错落因山结，四时红绿情”句。综合看起来，这座园林兼有山水楼台之胜，接近山麓，而旁逸通海的溪流；苑面本身不大，但周边四时花繁木蔚；可以见到山溪急流，也可以见到横海洲岛；水边有一定高度的楼台，可以远望落日归帆，是郑经和亲属游赏之地。

和东壁楼一样，这潜苑也不见载于台湾文献。根据早期的台湾地图来考察上述的特色，潜苑可能位于康熙间地图所示属于武定里分至的小桥塘附近地方，亦即乾隆间地图所示的海会寺和花园附近地方。^③台南文献记载有郑经时代所建、在邑治北五里永康里的游乐处所北园别馆；此地康熙三十四年改建完工取名海会寺，嘉庆后又名开元寺。位置与乾隆间地图所示的颇为符合，且据载该处亦林木清幽，寺内有“郑经井”，又藏有郑成功的一些遗物，^④似为郑氏所爱之地无疑，潜苑极有可能原在地此，而海会寺的前身即其中的主要建筑。唯一可疑之处，是康熙间地图所示的海会寺近海而乾隆间地图所示的海会寺近山，有所不同。但在乾隆间地图所示的河流情形和康熙间地图所示的已有不同，是否海会寺曾有迁建，只能别待考证了。《台湾外记》记郑经西征失败回

① 《郑成功全传》，页177—78，199—201。参看《从征实录》，页189—90；《海纪辑要》，页36。

② 参看《郑成功全传》，页164—65。

③ 彩绘康熙台湾舆图，现藏台湾省立博物馆，绘制年代及绘者不详，有说是“康熙六十一年黄叔瓚绘台湾番社图”，有说是“康熙中叶清官绘制台湾军备图”。彩绘乾隆台湾舆图，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有作原式复制流运（《台湾地图》，台北，1982），考订为清内廷所藏，“可见乾隆中叶台湾开发之景况”。原色书册影本可见《寻根探源》（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2）。

④ 参见《郑成功全传》，页336—37。

台后，在洲仔尾泽地建造园亭，种植花木，作为与文武将士围射酣乐之地之外，又身与诸妾候移居于内，纵情花酒等等。^①这是郑经晚年行乐的园林，从不同时期的地图看，都不会是西征前已有的潜苑。

根据〈自序〉所言，《东壁楼集》各诗均是郑经东居台湾时所作。我们知道，永历十六年壬寅（1662，清康熙元年）二月郑成功开创承天府（赤嵌城）和天兴、万年二县时，并改台湾（当时的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②依本集〈题东宁胜境〉（卷四、七言律诗第一首）、〈忆在铜陵时有感作〉（卷八、七言绝句第七首——此处的铜陵即是郑经永历十七年（1663）十二月继金門及厦门为清兵所破后退驻的铜山）、〈驻师澎湖除夜作得江字〉、〈闻西方反正喜咏得诚字〉（卷五、五言排律最后二首）、〈和康甫应天讨虏大海出师〉（卷四、七言律诗末首）等诗的编次看来，此集所涵盖的时间，正包括了郑经永历十八年甲辰（1644）三月退守台湾起至永历二十八年甲寅（1674）三月郑军出海入闽的整整十年。这无疑是在研究这时期郑经个人经历以及明郑政权的情状的绝对可靠而高度有用的一手材料。

其年五月成功居於東都，当时郑经守御思明州的序门，而在台的主要将领则在实行拥立成功弟郑袭取代郑经的谋略。直到十月郑经率兵入台城胜利后，郑经才继续成功占领台湾的局面才告底定。但次年正月郑经便回序门，直到永历十八年甲寅（1644）三月他率军沿海最后据点《延平二王遗集》中郑经诗作的质疑。铜山岛信，才学家并改都正式写入台湾，到台始改東都為東寧，升天興、万年二县為州。^③

用可靠的资料时，我们必需先处理一些未必可靠的资料：传世现有中央图书馆所藏、见刊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等处的清抄本《延平二王遗集》，内收题名“大木”（郑成功别字）作诗八首，题名“元之”（郑经别字或别号）作诗十二首、谕五首，以及未署名月姓名跋尾一首。^④跋称诸诗系据跋者表侄“新得旧册中”原卷抄录，墨谕则是跋者见于“海东夫子所”而抄出附录于后的。此集连横未及见，故此所著《台湾诗乘》没有次论。^⑤杨家骆作《延平二王遗集系年考》，作为收入《民族正气丛书》中此集的代序。^⑥据其考论，“是集钞于雍正七年或稍前，跋作于雍正七年或稍后”，跋者所称的“海东夫子”或即吕留良之弟，因目案而被清廷斩决的吕毅中。杨氏信此集之真，故为诸诗作系年考。后陈汉光编《台湾诗录》，亦全收入，注按诗作年代与杨氏所系基本无异。^⑦因为郑氏传世的文字绝少，故此集所载是否真为郑氏父子之作，虽有疑问，但仍被视为台湾文献的瑰宝，多次刊印。

照我看来，《延平二王遗集》“大木”名下各诗，还很有可能是郑成功所作的，“元之”名下的墨谕，是郑经所作或用他的名义颁发的可能性也很高。但“元之”名下的诗，至少十二首中的前九首，都不大可能是郑经所作的。“元之”名下的墨谕和诗什来源不同，这在无名氏跋文中已有交待，所以作者如有不同，并不矛盾。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元之”名下的诗什，都不见于《东壁楼集》之内。如据杨家骆所作的系年看，这些诗中却有作于《东壁楼集》所涵盖的1644—1674郑经居台的时期之内的，这是极不合理和很不可能的。

杨氏的系年，明郑历史其实并无法给它提供有利的依据，这从以下对《延平二王遗集》中归属郑经的诗作的考析便可知道。“元之”名下诗第五首，题作〈与群公分地赋诗得京口〉，诗云：

“京口瓜州指顾间，春风几度到钟山，迷离绿遍江南地，千里怀人去不还”。杨家骆系年认为作年“当为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随成功军克镇江，薄江宁，谒孝陵时作，经时年十七矣”。第一首题作〈痛孝陵沦陷〉，诗云：“故国河山在，孝陵秋草深，寒云自来去，遥望更伤心”。杨氏认为“当亦同年败退金厦前作”。按：杨氏援史证诗，然后因诗考史，做法原本可取，如果所援翔实，自然可以重构正确的历史时地事件。可是，明郑历史的可靠材料，都未能为他的立说给予可靠支持。根据杨英《从征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和夏琳《海纪辑要》这些高度可靠的记载，^⑧首先，郑经并没有永历十三年随父北征的记载。永历十三年五月，郑成功出师大举北图江南，留前提督黄廷、兵官洪旭及户官郑泰留守厦门，自将出海；八月初十日，师次羊山，遇暴风，“覆舟五千余号，溺死数千人；赐姓中军船打破，失六妃嫔、二公子、三公子、五公子，凡二百三十一人”，^⑨于是退回舟山修理战舰和到其他地方整补器餉。次年永历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瓜州，二十二日陷镇江府城（京口）。七月初七日各镇兵开始分路屯扎南京城外各地，十七日开始攻城，二十三大大势已溃，成功已先抽兵下船；二十四日退至镇江，二十八日“诸将领俱下船，驾入长江”；九月初七日，回师至思明州（厦门）。

郑成功这次北伐，共用“甲士十七万，铁人八千，战船八千”，^⑩文武官将近六十人，但曾与议定策北伐的参军陈永华却不在内，^⑪而实“居守”厦门。^⑫同样，这时期之内，郑经也没有随军的纪录。郑经是郑成功的嫡长子，也是他的事业继承人，照常理来理解，在像北图金陵这种存亡难卜但又是关键性的军事行动中，把世子留在基地维系人心和监督守将，是绝对正常的。事实上，郑成功的元配董氏也没有从军北征，这和后二年（永历十五年）郑成功攻台湾时；留董氏和郑经在厦门的做法，正是一致的。同理，据《东壁楼集·自序》所说的“及先王宾天，始出临戎”，可见十八岁的郑经既不带兵指挥作战，自无“与群公分地”战守之事。那么〈与群公分地赋诗得京口〉的重点只是分地赋诗，各咏一地，此诗作者分得京口，故咏京口。赋诗的背景可能真是北伐江南之役，但作诗的时地却不必是北伐的当时当地，诗的作者也不必是参与战役的人。

同样道理，第一首〈痛孝陵沦陷〉，也不必作于金陵战役失败撤回金厦之前。孝陵沦陷，是在成功此次北伐之前。而成功进围金陵，“由凤仪门登岸，屯军岳庙山，望祭太祖孝陵，再拜劬哭，哀动三军，诸将士无不感奋”，^⑬虽或确有其事，但一则事在夏天，二则并未攻入金陵；且七月二十四日已至镇江，诗中“秋草”、“寒云”的景象，全无着落。所以此诗与其为“随军”的郑经所作，不如作郑军兵败退走后，时人伤金陵不下，孝陵若再度沦陷之为有意义和可能。

按：《东壁楼集》有七律〈咏昔年北征〉一首（4/2上），乍看题目，似乎可为郑经参与北伐一事作证。其实不然，该诗云：

昔岁出师往北征，弯弓带甲马蹄轻。风吹旗旆龙蛇动，雪映刀兵日月明。荒草溪边麋鹿隐，青松山
里鸟鸣惊。犹须武将宣威力，一笛长歌奏凯声。（总评：“气韵沉雄，结有力”。）

这首诗顾名思义是“咏”事诗，不是亲身与事的描写或追述。它不但没有江海船舰的气息，反而

① 《台湾外记》，页304。

② 《从征实录》，页189—90。

③ 此集多处印行，抄本影印本主要有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

④ 连横《台湾诗乘》（台北：台湾银行，1960；台湾文献丛刊第64种）卷一（页1）收录《延平二王遗集》未见的郑成功诗二首，杨家骆《延平二王遗集系年考》谓一首或为少作，另一首决非成功之作，所说甚当。

⑤ 杨家骆《延平二王遗集系年考》，《文史资料》第一辑（1959）6，页17—18；《延平二王遗集》（台北：世界书局，1962）卷首。

⑥ 陈汉光《台湾诗录》（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页38—44。

⑧ 郑成功二次北伐全程，详见《从征实录》，页124—167；略见《台湾外记》，页135—144；《海上见闻录》，页28—36；及《海纪辑要》，页21—24。

⑨ 引文从《海上见闻录》，页27；数字《从征实录》（页132）相同。其他记载稍有出入：《海纪辑要》作“覆没八千余人”，但只“次子从军，溺焉”（页22）；《台湾外记》作“失四子妾，七子裕，八子温”（页137），未确，《台湾通史辨误》（页24—25）有所辨析。又，八月初十羊山遇风，时日从《从征实录》，他书皆作七月份事。

⑩ 《海纪辑要》，页22。

⑪ 各官职称名字，见《台湾外记》，页136；陈永华与谋处，见同书页131。

⑫ 康熙五十一年（1712，壬辰）序，郑达《野史元文》（台北：台湾银行，1965；台湾文献丛刊第209种），页173，〈郑成功海东事·陈永华传〉。

⑬ 《海纪辑要》，页24；《从征实录》未载此事。又《台湾外记》（页141）系此事于七月十二日。

有关山谿谷的景象；它的“风吹”和“雪影”背影，和郑成功二次北伐的出兵于五月六月间绝对不类。其实这“咏”有可能是因观看征战图画而发，好像集中七言古诗《读喜达集有感依诸公韵成篇》（2/20下）一首因读所咏诗集而作的创作背景一样（此诗详后说）。它的主旨只在表达征战没有进展、未得成功，如山中鸪鸟惊叫“行不得也哥哥”的样子，而盼望武将能够宣威奏捷。它不能作为郑经参加郑成功二次北征师旅的证据。

再从诗歌的艺术造诣层面来看，上述两首《延平二王遗集》中“元之”名下的诗作，比起上面刚引的郑经《咏昔年北征》和《东壁楼集》的《忆在铜陵时有感作》（8/2上），格调和章句都要优胜。后诗云：

岭上青松带雪寒，且连步履不凋残。夜深忽忆前时事，说与傍人仔细看。

此诗内容贫乏到极，与题意必须表达的实在不称。按：此诗所称的“铜陵”，并非郑兵未曾到过的安徽池州府的铜陵县，而是康熙二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郑经因金门、厦门为清兵所破而退守的铜山所（岛），^①其地与广东潮州隔界。这地方是郑经安危存亡过渡期中的关键之地，他后来的追忆“有感”，竟然这样的虚泛，郑经作此诗时，较之“元之”名下作品的假定时年，至少要成熟了六七年，诗歌的造诣却相反地浅薄了许多。这也可以反映“元之”名下之作，未必便是郑经之作。

《延平二王遗集》“元之”名下各诗，看来最有可能是郑经作的是第二首《满首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但照上引数诗的分析考论，也不必定是他的作品。此诗原文如下：

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夕塞戈矛。

杨家駱系年此诗作于永历三十四年（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因为是月“清平南将军裴塔与（郑）经书，有‘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之语’。并说‘次年经毙，集中诸诗，当以是首为最晚也。’这个招降的时间和归附的条件都是不符合历史情事的。有关的官私记载，都没有此事。郑经居台未西征入闽之前，只有永历二十三年（康熙八年，1669）七月清廷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奉命入闽后，会议遣官渡海招抚一起。清方使者为加太常卿衔彰化知府蔡天颜和同都督金事季佐。不登岸、不剃头、称藩如朝鲜例，其实是郑经所提的归附条件，不是清方招降的条件。故此郑经使者虽曾入泉州谈判，事情终无结果。^②到了康熙十九年时，郑经已经大败返台，清廷更加无须（事实上也未曾）以不登岸、不易服的条件招降了。所以这首诗如果是郑经所作，正当作于居台之时，亦即《东壁楼集》所涵盖的时间内。此诗气韵较前引二首沉郁而雄壮，主题鲜明，是上好的励志作品，除了表达心志之外，还可以为作者苦做形象，如果是郑经作的，他正可以引以自豪，向一切敌我世人证示他的孤忠勇气。可是，它偏却不见收于《东壁楼集》之内。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可能以遗漏二字解释，唯一的理由，便是此诗并非他的作品。当然，这首诗也没有一定非郑经所作便成了和作者身份口吻不称的文字和意境，它和前述赋京口、吊孝陵二诗同样可以是并世他人之作。

《延平二王遗集》“元之”诸诗的第三、四首题为《三月八日宴群公于东阁，道及崇、弘两朝事，不胜痛恨温、周、马、阮败坏天下，以至今日胡羯蹈〔滔〕天而莫能遏也，爰制数章，志乱离之由云尔》。第六至第九首题为《读张公煌言满洲宫词，足徵其杂揉之实；李御史来东都，又道数事，乃续之》。杨家駱系年认为前二首“有寡人嗣位句，则其作于永历十六年（1662、康熙元年）嗣位后亦可断”。后四首“当为永历十五年（1661、即顺治十八年）五月改台湾为东都，至十八年（1664，即康熙三年）八月改东都为东宁间作；题中有李御史来东都语，故知必在永历十八年八月前也”。其实这二个推订都因考虑不周和没有比较而不得其实。

① 《海上见闻录》，页43；《海纪辑要》，页34—35。

② 《海上见闻录》，页44；《海纪辑要》，页37。《台湾外记》，页199—202，记此事尤详。

这六首《延平二王遗集》中诗和《东壁楼集》中作品的诗风截然不同，文学水准前者绝对高于后者。前两首对于明亡痛史，体会至深，词情并茂，没有一处是《东壁楼集》诸诗所能比拟的。如果说是二十岁时的郑经所作的，从《东壁楼集》所载的三首咏史之作的识见和诗才比较看来，^①是很不可能的。杨氏以第三首中有“寡人嗣位兮贡志未副，每与群公道及兮伤悲而涕泪难收”等句，断定这“嗣位”的“寡人”为嗣延平王郑经，未免近于勇决。郑经有没有“每与群公道及”和像诗中那样的分析崇祯及弘光两朝败亡的原由，本身便是一大问题。第四首（同题）结尾两句说“贤人之不甘污辱兮蹈东海而远颺，痛恨乎奸谄遗客无穷兮迨今兹而强胡虚焰方长”，看来有点像是郑经远退台湾的处境，但时间上却不容许作这样假设：如果二诗作于台湾，则《东壁楼集》宜加收入，而该集实无此二诗。诗题说“三月八日宴群公于东阁”，与康熙三年三月十日铜山弃守后，^②郑经再度过台湾的时间又不符合。郑成功卒于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五月，报至厦门，郑经才称嗣延平王世子招讨大将军。郑经第一次率兵入台救平台将拥立其叔父郑袭的兵变，确定自己为台湾主人的时间，是同年十月份内之事，次年正月十一日，即率将领及郑袭回抵厦门，根本没有在台湾渡过“三月八日”。所以永历十六、十八两年，都没可能作此诗，而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三月的郑经，则因海澄有密献城之事，欲亲往接应而忙于整理舟师，^③都不是与遗老“群公”宴会赋诗的时候。更值得注意的，是“寡人”这词的使用。杨英《从征实录》这部可靠史作收录了郑成功封延平王北伐起至少十五个谕告、一个批文和一个禁令，以及部下给他所上的二个启陈，都是以“本藩”自称，“藩主”被称，绝无“寡人”之称。^④到了金陵败回，成功又上书自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军印。^⑤郑经嗣位但称“嗣世子”，当时文献称为“世藩”，和《东壁楼集·自序》的以“余”自称，不以王者自居，措词都是严谨一致的。这样看来，不独这有“寡人嗣位”句的诗作，不是郑经的文字，^⑥连带《延平二王遗集》中所载情事合属郑经的五道中四道皆称“孤”或“寡人”的墨谕，也就不必是郑经的原作了。

至于第六至第九首咏满洲内宫秘事之不当为郑经作品，除了文学境界高下的判别外，时间条件也是辨定的要素。永历十八年（康熙三年）三月中郑经再度来台，八月改东都为东宁。此题四诗系因“李御史来东都”而作，如果作于郑经此次来台之后，理当见于《东壁楼集》，但该集却无此诗，也没有任何可能与“李御史”其人有关的名字存在。如果作于这次来台之前，则“李御史来东都”一语，便无著落。唯一可能便是第一次来台的二三个月之内，其时台湾已称东都，但郑经却是忙于平乱之战，很可能有这类的创作活动。

总之，《延平二王遗集》中“元之”名下十二诗，诚如杨家駱所言，只有“第十至第十二首仿

① 《东壁楼集》，2/12上，《咏史》，3/2下，《赞汉高帝》，8/7下，《王昭君》。

② 此处日子从《台湾外记》，页183。

③ 海澄事见《台湾外记》，页177；参见《海上见闻录》，页42。其他返台湾厦门之役，各书均同。

④ 《从征实录》，页110—194。

⑤ 《台湾外记》，页145。

⑥ 照此二诗词气和结尾部份看，原都绍兴的监国鲁王朱以海（1618—1662）倒似似它们的作者。鲁王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1645）因六月即位，次年仲夏兵败，浮海入舟山，为闽中舟师迎至厦门等地。顺治四年丁亥春移师长垣，称鲁监国二年，后来再败后退，才又南下，季永历历，谢去监国名号，居于金门。据时人张燧所言及道光间周凯的综合考证：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卒后，海上诸臣有议尊鲁王监国之事，会王得哮喘，卒于同年十一月。若必以此处所讨论的二诗与此事比附，则只能于“寡人嗣位”句的作者问题有所发明，但却与更重要的诗题所书的“三月八日宴群公于东阁”的时间问题，绝不配合。我推测二诗可能是鲁王顺治四年春天移驻长垣时侯的作品。鲁王的填墓和圻志1959年8月在金门发为《明》，当时胡适、陈汉光、廖汉臣等都有考据文字发表，各人所作和圻志原文以及其后包道彰的圻志阙展文校读，均收于包道彰编《明监国鲁王圻志之研究》（台北：中华书局编委会，1968），周凯《明监国鲁王圻志考索》，在此书页19—20。张燧所言，见所著《张苍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26—29，《鲁国主启》三书，页245，《年谱》康熙元年壬寅四十三岁条下。鲁王行迹，参看黄宗羲《行朝录》（《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4/133—44。

古诗，不及时事，疑为早岁习诗之作”近是。但其实仍不必是习作，这三首题作《仿行行重行行》、《仿迢迢牵牛星》和《仿涉江采芙蓉》的仿古之作，风格和《东壁楼集》的多首仿古之作相近，只是水平还要高些。这些诗，作于《东壁楼集》刊出后的可能，比作于此集刊出之前的可能为大。其他上面以论的九首，如果真的或有郑经所作，那么它们至少也不能是他前期居台十年间之作。

郑经对吴三桂的冀望

《延平二王遗集》中“元之”名下诸诗，既然难以据用，《东壁楼集》所载的诗歌，便成了探解这时间内郑经本人身心行事和与他有关的事物的唯一直接而可靠的资料了。以它们为据，我们看出郑经无疑自幼受学，长大能诗，退守台湾后，情有结郁，抒奇以诗。十年之间所作，愿意留传的尚有480首之多，平均每月作诗四首，可算是个允文允武，真正钟情风雅的侯门佳胄了。这表现和康熙中可靠记载所称的他“工诗赋，善弓马”，^①至为符合。

这些诗歌作为史料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它们没有道及台湾各处山川原港和城乡居聚等地理名称，没有咏述风土民俗和民生物态，没有触及岛上的实际时事，而提及的真实时人也只有四五名而已，因而无法据以了解当时的有关实况。诗歌的命题和取材，大多数以寄情遣兴和山川风月为主，有托意而未必有实指。诗歌所夹附的评语，不知出自何人，全是佳评赞美。这是意料中事，但主要仍是从文字角度评论，凡是稍涉时局的，多不置评。这样便形成了作者以诗人自命而评者也以诗人目之的结果，重点放在了诗歌的艺术层面上，没有同时为历史情事留下注脚。综合说来，这些累积十年的诗歌，整体上确从多方面反映了郑经这个人物的家庭身世、生活嗜好、学向交游、心情意志、对于时人时事的观感等等。有的是不著意的反映，但也有不少色彩鲜明、立场明显，足以反映郑经个人的志向和真情的，下文将各略予引析。

但值得首先论析的，还是《东壁楼集》的《自序》。这篇手书板刻的文字的可贵之处，不独在于它留下了郑经难得一见的手迹的一斑，也不独在于它是郑经长期从事诗歌写作的背景自白，更重要的还是它作为郑经诗歌创作和结集刊布的原因的说词。这篇无疑具有政治意图的文字，它的意旨所在和它有无如实反映集中诗歌的内容和意义等处，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自序》的主旨明确而一贯：《东壁楼集》的刻刊在表明郑经自己居东吟咏之意，而此意所托，“无非西方美人之思”。这部诗集的刊印，是及时向世人或竟向“西方美人”本人表明对“西方美人”的一贯思慕。这个“西方美人”，固然是从《诗经·邶风·简兮》一诗卒章四句“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一处出典。古典所举的今人究竟是谁，才是值得探讨的对象，但还要先从原典的意思开始，才能明白郑经所指。《诗经》的“西方美人”，郑玄《笺》说是指“周室之贤者”；《国语·晋语》韦昭注引《诗》说：“西方谓周也”。^②朱熹《诗集传》却说：“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亦以美人目其君也”。^③这两种对郑经的典故识解最有可能发生影响的传统对“美人”虽有“贤者”和“王者”的不同，但以诗人叹慕而远不及见的西方“周室”为“美人”所在则为一一致。就郑经当世的情况而言，这个“周室”，已经没法是指南明的永历朝廷了，这个“美人”也同样不能比喻为个人品行为人所称道、代表气度有类盛王的永历

① 《海纪辑要》，页67。

② 郑玄等注说，参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90。

③ 朱熹《诗集传》（《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2/19上。

帝朱由榔了。^④朱由榔和他的十二岁太子儿子在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已在昆明吴三桂令下被弓弦绞决了。朱由榔的母亲太后、妻子皇后和宫人李贵芳数日后押送北京，后来也都在途中自杀了。^⑤不久，永历帝的最后武力依靠李定国也兵败走死，儿子降清。南明至此正式灭亡。^⑥到郑经作这篇《自序》时，它已经灭亡了十二年。

郑经的“西方美人”既不可能是指“王者”的朱由榔，揆诸时情，它能指的便只有清朝原封平西王、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兴兵反清、“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⑦次年（即郑经所奉的永历三十八年，甲寅）正月改称周王元年、改元利用的“贤者”吴三桂了。^⑧在郑经居台的十年期间，谁可以寄托思致的旧朝“周室贤者”也不存在。他诗集《自序》所称一切吟咏所寓所致的“西方美人之思”中的“思”，固然指的是藉贤者之力以恢复王室（明室）之怀思；他刊行诗集“以明己志”，要明的也就是这份思贤恢复之志。而当时足以寄托这种思志的人，从现存的文件看，实际则只有异志颇为时人所知的明室旧臣吴三桂，而表面两可的则是吴三桂讨清檄文中创造出来的崇祯帝“三太子”其人（说详后来）。“美人”一典的二意，郑经竟然都能兼顾并用了。

郑经对吴三桂有所托望是否明智与合理，史家可以评论，但其事却可确信无疑。早在永历二十四年（康熙九年，1670）春，郑经便曾遣监纪吴宏济往聘吴三桂，其致书要略，《海纪辑要》收录如下：

经儿发未操，即耳大名。每读殿下家书，敬慕忠孝，未尝不拊掌慨叹，感佩而随之以泣也。今者四海靡定，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特遣推官吴宏济奉候福履。敬回虽小，楼船千艘，甲士十万，惟殿下所使之。顺侯德音，无任主臣。^⑨

这个外交词令中的“天外孤臣”，当然不是郑经向吴三桂作出的单称；而是他向吴三桂表明在中夏大明这个共同旗帜之下彼此的相同性，彼此原则和性质上是对等的藩邦，虽则事实上他希望吴三桂能起来领导反清，作一番真正的“忠孝激烈”之事。《东壁楼集》有五律《偶见题》（3/19下）：“携剑游西去，邓公杖策同。十年存白发，百折见丹衷。风雨关山外，衣冠海国中。休辞跋涉苦，万里一孤篷”。从编次看，此诗属于后期之作，用了东汉邓禹杖策往河北佐光武帝运筹帷幄的典故，而诗中人物游的却是西方，要传达的又是一份海外的丹衷，诗意和聘演致书之举极为符合，可以反证吴宏济之见吴三桂为确有其事。吴三桂有没有答郑经书，现已不能寻考，但从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调解郑经和耿精忠争地交恶的事看，^⑩他和郑经是保持了一定的良好关系的。

郑经之托望于吴三桂，就当时的情势来说，是实际而可理解的。南明彻底灭亡后，不在清朝臣属范围内的，事实只有台湾的郑经一家，而当时明朝降臣中要鼓动起来反抗清朝的，从兵力、财力、形势等各方面考量，也只有吴三桂最具实力和成功希望。寄望吴三桂起来反清复明，事实上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心理情愿。当时朝鲜在北京的使者，曾有“三桂之拥立朱氏子孙，虽未见文报，人多言之，而亦未能详也”的报告，^⑪便是很好的反映。事实上，吴三桂称周改元时，便有人建议他不如“缟素待罪，以告天下”，^⑫正树义旗。之后又有人建议他“改定为大明名号，以收拢人心，

① 有关朱由榔的评价，参看李治亭《吴三桂大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页324。

② 《吴三桂大传》，页322—23。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474/12841，《吴三桂列传》。

④ 《清史稿》，474/12843，《吴三桂列传》。

⑤ 吴三桂改元“利用”事，参看《吴三桂大传》，页462—63。

⑥ 《海纪辑要》，页38。

⑦ 《海纪辑要》，页43；《台湾外记》，页224—25，较详。

⑧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3993—94；《吴三桂大传》，页465，亦引。

⑨ 《吴三桂大传》，页463。

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① 吴三桂终于没有采纳而大失人望，但在此之前，他却曾是一时众志所托的所在。

郑经对于吴三桂的西南起事，兴奋之情见于诗歌。《东壁楼集》五言排律末首〈闻西方反正喜咏得诚字〉（5/14下）言：

群胡乱宰官，百折守丹诚。海鸟无鸾信，乡关断鸡声。义师兴焚劫，壮气器长鲸。旗海荆襄出，刀兵日月明。一闻团色动，满喜又心惊。愿扫腥羶幕，悉伏燕燕京。更开朝贡路，再筑受降城。（句下小字评：“忠诚可倚”。）

此诗大概作于康熙十三年春初。吴三桂将反时，曾派人往通海澄守将赵得胜，要他传书给耿精忠和郑经、黄梧等人，约谋同起。^② 照这首诗的意句来看，此时郑经还未接到吴三桂的书函，故此仅表其惊喜、乐见其成之情，而没有同时作出愿为先驱、配合行动的示意。但吴三桂的行动，无疑已符合了郑经长期的“西方美人之思”了。

对于吴三桂的起事，郑经固然有着和自己处境以及前途实相关连的现实考虑，但同时也有一番托吴三桂而建复明大业的憧憬。日本文献《华夷变态》收录了中土失传的吴三桂讨清檄文，便以“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开首，接着大言自己对明亡的痛心和隐忍复明的苦心，伪造出密养崇祯三太子三十余年之言，然后说今“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刻期进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耿【精忠】、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经】，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等等是非混淆之言。^③ 这道檄文对当时不知或尚未知实情尽情的反清人士所起的作用，绝对不能和冷静客观的后世史家同日而语。时人即使明知其伪，也乐得利用它来作复明起事的依据。祭出“三太子”来作号召天下的共主，使人不“恋目前之私恩，[而]忘中原之故主”，对当时的真心人或有心人，均有效用。这道驰传四方的讨清檄文，郑经自元不见之理，故此到康熙十三年五月他在厦门看到吴三桂约“速整貔貅，大引舟师，径取金陵，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的书信时，^④ 才作了如下的答书：

闻殿下忘家为国，不顾其子，欲伸大义于天下，不禁雀跃，既庆朝廷之光复，又喜所怀之不谬，故献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业，必先建天下之大义，以殿下之忠贞，而择立先帝之苗裔，则足以号召人心，而感奋忠义。不佞所以区区道及，亦欲依日月之末光，早建匡复之业，枕戈待旦，以俟会师之举尔。^⑤

表明了一切举动，当以恢复明室为第一义。郑经奉永历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西征，这是人尽皆知之事。这个举动，和答吴三桂书所言，以及他自己驰传四方的檄文所说的重心、思想和立场都是一致的。檄文要言如下：

洪惟二祖列宗，丰功伟业，泽润民生，践土食毛，世承君德，即有亡国之祸，非有失道之主，而深山龙驭，死守社稷，尤忠臣义士所推心而感泣者也。……愿与同志之士共崇故主之恩，雪国家之耻，救民生之祸。……同建匡复之功，永快升平之乐。^⑥

他也不知道，当时滇南回中、秦黔楚蜀“莫不骚动，人怀逐鹿之心，众思执辔之逐”，是个群起竞争的局面，但在反清复明这个前提之下，他仍然选在登陆初定之时，宣示其长久的“西方美人之

思”以表明自己“居东”不忘恢复之意。

郑经的“西方美人”，归根到底，便是恢复明室的象征和代号。作《东壁楼集·自序》时，他对心中原来的“西方美人”还存眷恋。当然他实在也希望新出的“西方美人”三太子能成为四方所望以号召天下的虚位“美人”。但这份眷恋和这份冀望，在入泉州作〈自序〉后不久，便因吴三桂的彻底自暴野心，告幻灭。吴三桂给上引郑经的答书覆书说：

不佞积愤三十年，因心害德，有不可尽白于人者。殿下能洞见本怀，万里精神，敬慕其契合如此！先朝盛德，何日忘之？然藉拥戴以号召人心，乃草创故智，不慎于始，后必终凶。项氏之子义帝，诸将之于夏桀，可鉴也。使大势既定，亲贤自不乏人，与天下公议之，一德同心，宣化之例何必逊于古人耶？倡义除暴，昔当荆首，故改为周，且列国即位改元，春秋正例，师古正名，窃附斯义耳。^⑦

据说郑经阅毕叹曰：“吴藩萌念已差，不但不能取信天下，号召英雄，实为后世羞耳。”只好厚待来使，令回报命。^⑧ “西方美人”这个典故，恐怕他从此也不会再用了。

郑经复明的决志和居台的政治困境

郑经恢复明室的志节和立场，无疑从上述距明郑败亡为时不久的私家记述和这些记述所引载的文件，已经得到充份的正面反映。同情他的僑人，也作了“嗣王位十九年，虽得七府，雄据一方，而终身称世子，奉明正朔不少变，舆论称之”的肯定。^⑨ 但史家所需确定的，却是郑经这些表现，是否只停留于表面应时的政治文告和外交辞令等层面上。易言之，我们能否对他从事“原心”的工作，以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情意和这情意发展的心路历程。这点《东壁楼集》依写作先后编次的诗歌无疑便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东壁楼集》中明显可以反映郑经心中最大的政治志业的多首诗作，都是充满了痛明反清，待时恢复的志概；诗作时间不同，但意旨前后如一。以下依次选录在台十年中约略分期的前期诗二首和中后期诗各一首，稍作分析，以见大概。

〈独不见〉（1/3上，五言排律）

腥羶满中原，林木巢胡燕。天子紫尘出，皆罪诸巨寇（句下小字评：“责得是”）。壮士怀激烈，志心在一片，义旗照天地，駉踪蔽日暝。徒苦诸群孽，作计良不孝。胡骑一朝至，人人自为变。我今兴王师，计罪民是嗜。组练熊黑卒，连营在东海。企望青鸾至，年年独不见。

〈悲中原未复〉（4/4上，七律）

朔虏腥尘逸九州，忠臣义士怀悲愁。既元博浪子房击，须效中流祖逖舟。故国山河尽灰色，旧京宫阙化丘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

〈嘹唳黄昏知雁过〉（4/10下，七律）

群碧碧汉空苍苍，怀念临风正我伤。尝胆卧薪思越主，复仇雪耻忆吴娃。及时休虑万山阻，未遇元谋百事乖。夜静月明云绝影，闻声惟见雁行排。

〈不寐〉（1/19下，五古）

寂寞常不寐，中夜独长吁。腥羶满天地，中原尽狼胡。政令出群小，诛戮皆元辜。万姓遭狼毒，谁能振臂呼。闻风常起舞，对月问悲语。听潮思击楫，夜雪忆平吴。蓬蒿待时动，组练十万夫。（总评：“骨老气沉”。）

这四首不同时期的诗作，透露了郑经在台湾谋求聚兵待时，复仇雪耻，驱逐满清，澄清天下，救民水火的一贯志向。各诗词旨明白，不费解说；值得揭示的，只有郑经的政治意识随着时间的

① 《吴三桂大传》，页 464。

② 《台湾外记》，页 209—210。

③ 引自《吴三桂大传》，页 443—45。按：耿精忠反清檄文，亦有“共奉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高皇大业，必留隆准之遗，明室中兴，斯有攀援之瑞”等依托复明为号召之语，见《海纪辑要》，页 39—40。

④ 《台湾外记》，页 211。

⑤ 《台湾外记》，页 211。

⑥ 《海纪辑要》，页 41。

⑦ 《台湾外记》，页 218。

⑧ 《台湾外记》，页 218。

⑨ 《海纪辑要》，页 67。

增长而增长成熟一点。《独不见》的主旨在说他继承失败的郑成功继续努力。诗中蒙尘而出的“天子”，当指永历帝，而忠心举义但作计不善的“壮士”，则指郑成功。郑成功北伐失败，东渡避台，满兵乘胜南下，人心不坚，金厦连破，卒之导至郑经入居东宁，待机再起，是此诗的总背景。诗中责备南明朝廷诸臣和不满明郑部下之意；在其他诗中也有同样反映。但这只是停留于军事局势的层面上的。到了《不寐》诗时，郑经关怀的，已是异族政权下的政治问题了。他的休养生息，不只为要复仇，还有救民意识；意态较前更为成熟。

和这些明达不忘恢复之志的诗歌相应的，还有不少以从军为主题的仿古古诗，也是遍见于诗集的前后各处。以下各期选录一首，略作范例。

《从军行》(1/2下，五古)：

壮士喜从戎，年少横胸臆。雕弓大羽箭，骏马黄金勒。锐气冲牛斗，扬扬意自得。挥鞭逐队去，前往卢龙域。风沙朝暮起，日光变无色。霜雪积阶下，山河尽填塞。弱冠从军来，头发今半黑。不辞跋涉苦，矢志在为国。国仇不共戴，直捣转北极。

《军行别》(1/21下，集中唯一四言古诗)

朔方识，中原移，群邪起，正道衰。国家遭变，天子流离。士怀激烈，共兴义师。君行策马，临风感悲。妾与君别，在水之涯。春风发发，起我离思。燕燕于飞，双双背翅。君为大义，不敢怨客。寸心惻惻，念兹在兹。行矣始此，万马驱驰。努力加餐，慰我情私。(总评：“哀而不伤”。)

《关山月得袖字》(1/24下，五古)：

万里关山月，长照征夫袖。碧汉绝纤云，清辉如白昼。(句下小字评：“起四句有古意”。)明月故乡同，山水异方秀。城头夜柝鸣，空山啼猿吼。旌旗卷暮烟，星角耀朝宿。将军不展甲，令严谨烽火。何日靖朔氛，归就单于首。(总评：“边关乡思，凄婉而壮”。)

郑经鲜明的反清复明意志和心衷，几乎可说是自少而然的，从上面这些诗歌看来，《东壁楼集·自序》所说“每读书史忠孝之事，未尝不感激涕零”的话，是忠实而可以信信的。在身处被动的不利环境中，他的恢复志事不易实行，造成《秋夜书怀》五言古诗中“渡海今十载，未能大披胆。岁月转相催，忧心自惨惨”(1/7下)的感叹。但他仍然保持了“余闲便舞双飞剑，无事常弯两石弓”(《自叹》，4/5上)，和“卧龙犹复待云雨，有日高飞遍九州”(《自叹自想》，8/2下)这种自强不息和自我期勉的励志心态。读明郑史的人，不难会对郑经在潜伏十年之后，在耿精忠叛清时即敢以微薄的军力渡海西征、抢陆争地一事称奇惊叹，现在有了《东壁楼集》所载这些寄怀言志的诗歌资讯，也就不难于理解和赞叹了。

郑经虽然能够苦节励志，但他在台湾所面对的内在人事环境，却明显的对他的意兴有所挫抑。《东壁楼集》很少有描绘真人实事之作，但却有很多对时人时事充满伤感和愤慨之言，反映了郑经对所处景况的态度和心情。集中五言绝句的第一首《偶吟再续》(7/1上)事实上最能说出郑经的“孤独”苦情。诗文如下：

众星待月明，明月自孤行。犹似一人出，扫除天下平。

——这是郑经对自己决志的表白。他的只为公好，我行我素的作风，和郑成功的如出一辙。但这却不是不能自明的“众星”随者所必愿认同和接受的。他撤守台湾，原是迫不得已之事，但既已来之，至少也得求暂时安之，故此七律诗卷的第一首《题东宁胜境》(4/1上)便有“曾闻先圣为难语，汉国衣冠万古同”之句。但随他来的人员，却不见得都乐于乘槎浮海之事。他面对的人才或缺，人心不一的情势，和郑成功当年初避台湾时的情势相似，只是情事毕竟不同，没有像郑成

功般遭到原本基地将官的杯葛和拒命罢了。^①从《东壁楼集》诗看来，郑经内心的忧郁和困苦实有多种。留人不住是其中之一，下诗可见：

《江头酌别》(4/15下，七律)

闻君将出作良臣，携手徘徊渡汉津。锐志功名方舍旧，留心社稷困更新。尔余传说调羹鼎，我学渊明流酒巾。分别离情须尽醉，飞觞交接助行频。(总评：“五六月事，却自洒脱”。)

人情不附，又是一种：

《晓思》(8/9上，七绝)

晓起萧萧风带寒，人情反覆路行难。愁思任是千飞絮，世俗犹然冷眼看。(句下小字评：“一腔热肠”);

还有忘恩不报，言论相乖的情况：

《遣愤》(4/16上，七律)

奔走东西历险艰，何时萧散任疏顽。忧深愁听孤鸣鹤，情懒喜看双集禽。报本乌鸦相反哺，知机黄鸟奏鸣鸾。闲行逢兴聊排解，都抑余怀一笔删。

郑经这种孤高寡和，苦心不为人所知惜的感受，在其他的诗篇中，也有所发泄。大概这些人原来都是他一时的亲近，而自己又是一邦之主，故此都只能以隐约之言、婉转之意来表达内心的痛愤和无奈了。这种愤郁之情，渐渐使他在感情上陷于严重孤独，终于夸张地到了集中五言古诗最后一首《春尽得心字》(1/30下)结句所说的“自恨无知己，惟鸟结知心”的地步。

这种无知己、无知心的情状，主要还是属于政治层面上的。郑成功和郑经二代矢志复明的苦心缺乏真正的同情者，是它的主要原因。郑经对亡明公卿士大夫的普遍不满甚至鄙视，又是加增这种情状的原因。《东壁楼集》七言古诗《读喜达集有感依诸公韵成篇》(2/20下)表达了郑经的感受：

避尘岛上春十夏，诸人半属朝公卿。空寄天子死社稷，廷臣惟有叹效声。(句下小字评：“更有不叹者矣”)。风波不历徒言苦，百折未经何患贞。亦有松柏终岁暮，半如蟪蛄求此生。安危未至先人望，患难临头已自行。人言反复偏无定，坐惜才定死后来。(总评：“可作诸公实录，读之能无汗下”?)

郑经这次的“有感”是深刻的。按：《喜达集》是顺治十四年(1657)前后人们给诸生郭大河的赠行诗作的结集，命名似取“喜达行在”之意。^②郭大河的老师，也是郑经亲善和倚重的长辈、隆武帝授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尚书、同安金门岛人卢若腾(永历十八年[康熙三年]卒于澎湖)曾为此集作序，给郑经的感叹留下了后人理解的背景。卢若腾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在浙东起兵抗清，郭大河是“诸生相从者十余辈”之一，事败之后，“一意严寒谷饮，时往来海岛间，不复与腥气毒雾相接。今(至是)遂决计西征，归依(永历)行阙”。卢若腾特壮其节，认为“书生未沾一命，而若节为贞，十年不字，间关万里以酬从王之愿，其于纲常名教，裨益宏多。”故此作序表意，并且发出“心同此心，事异其事，度难实效报国，何取虚迹欺人”之叹。^③郑经作此诗时，距离郭大河西征、卢若腾作序已经十多年，反映了他对那些随居东宁的明廷遗老的长期不满。他愈是歌颂那不求闻达但求自反其心、自尽其事的“诸生”，便是愈致轻薄于那些不历患难而自鸣忠贞、企望优遇的“公卿廷臣”。后者对国家兴亡所持的一种不关痛痒的现实态度，是郑经心里所

① 《海上见闻录》，页39—40；参看朱希祖《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叙》，《朱希祖先生文集(史实考证明清篇)》，页3154—58。按：此序全文颇长，有关考证，散附《清代官书证明台湾郑氏亡事》(台北：台湾银行，1963；台湾文献丛刊第174种)书中各处。

② 同时人钱秉铨有《喜达行在二十韵(永历二年冬十月到肇庆)》诗，可作此集命题意义参考，钱氏诗见所著《今稿》(汲山阁集选辑)(台北：台湾银行，1966；台湾文献丛刊第225种)，页134。

③ 郭大河与《喜达集》事。见卢若腾《留旧文选·喜达集序》，附录于所著《岛墟诗》(台北：台湾银行，1968；台湾文献丛刊第245种)，页50；卢氏抗清事，见同书页60—73表现各篇；又有《代延平王阙于皆谕将士》露布，见同书页75。

决不能接受的。

郑经对于居留台湾的残明宗室和先朝遗老的态度和待遇，向来存有二说。有的称他能对他们致“礼敬”；^①有的说他对宗室像宁靖王朱术桂“遂衰于礼”，不给他们衣食之资，还要徵赋他们的垦种所得；^②对郑成功所礼重的名人永历命官太仆寺少卿沈光文迫胁有加等等。^③从前面引录的《独不见》和上引这首因读《喜达集》有感而作的诗来推测，他对遗老们所致的礼敬，限于内心对他们的遣责，大概不会是衷心的和不可能太多了。郑经大概把他们当作一般慕虚名利的政客看待，而反衬地却形容了自己的清高脱俗。集中像七律《云卧留丹壑》的“久谢功名忘俗念，惟将诗酒自欢娱”（4/14上）和《感遇》的“寄辞为谢利名客，何若投簪坐绿阴”（4/22上）诗句，都是这种情感酝酿出来的例子。不难想像，失败而退居台湾，复明的素志又得不到一般的知心认同，正是长期带给郑经内心悲感而须藉诗歌排遣的原因了。

郑经的交游和婚姻、性情等等

郑经的“朋友”实在不多，《东壁楼集》显示了一个很狭窄的交游圈，做成一个孤立起来难以理解的现象。见于他的诗歌的人物，只有号复甫的陈永华，字正青的李茂春，名字未见的柯义宾，未书姓氏的“康甫”和不详其人的林羽官。陈永华是明郑台湾时期著名和最有贡献的政治家、郑经的亲家和西征时期台政代理人的东宁总制留守，^④李茂春是随郑成功来台的有名诗人隐士，^⑤柯义宾很可能是郑成功的长女婿柯良，^⑥“康甫”很可能是随同郑经西征的二名主将之一、郑经的亲家和侍卫冯锡范，^⑦林羽官只能看出是来台不久便西还老家的朋友或随员。^⑧这些人除了林羽官之外，都是郑经的诗友。集中和陈永华赠李茂春（或和陈永华以赠李茂春）之作共有三首，游陈永华的“憩园”之作有二首，和李茂春的有二首，赠李氏过访而作的有一首，和柯义宾的有二首，和“康甫”的也有二首。这些诗咏，一半以游园、过访、赏花、饮酒为事，内容无甚可观，但至少仍有二首，可以充份反映郑经一贯的恢复志概和心雄力拙、不为人谅的愤慨。

《和康甫应天讨虏大海出师》（4/28上，七律末首）

挥出西征驾战舟，长歌豪济中流。国家运迄今朝度，胡虏氛妖一旦收。万姓欢呼扶汉室，孤臣喜得见神州。十年遵养因时动，壮士何辞带沐秋。（总评：“气亦自雄。”）

《和复甫怒螺歌赠李正青依骥字韵》（2/42上，七古）

黄壤生长长江畔，千牛奇质成足尺。时吐明珠耀水滨，暗波渔人施网获。球为国宝肉为羞，惟存一壳光且泽。幸君好奇市以归，幸得展唇侍夜席。不期幸君反人情，却与蛭虫成莫逆。显我整鬃污泞泥，日友蝼蚁及蟪蛄。受彼以为席上珍，视我如透袋德客。长部都令亦何益，无毛羽兮难奋翮。岂知微物有

灵魂，虽死犹能起虜群。因风雨兮破垣旅，乘雷霆兮归海沙。入沧波兮欢所适，君其悲兮去后惜。（句下小字评：“末段叙致，忽调音节，令人魂魄为动。”）从《东壁楼集》全部的诗歌来看，这两首和作实在形成了感情上的强烈对比，和康甫诗的喜壮之情，只有从和复甫诗的悲凉之意才能更深体味。兵败退守的嗣王国土，宛如珠肉皆去之螺，其质虽美且贵，在时人的取舍中，却曾不能与蛭虫贱物相比，缺乏毛羽，徒自忧郁，能够做到的，也只有希望乘时复起，得志自伸罢了。

郑经这种因政治志向和政治处境不能协调而产生的孤独和悲愤之情，看来也没有因家庭生活的可能慰藉而得以抒减。《东壁楼集》除了五律《重阳夜作》（1/16下）有“欲得萱堂喜，插萸戏彩裾”句提及娱孝母亲董氏之意外，没有任何与兄弟伯叔、妻儿女女的诗句存在。但却有一首与他的婚姻生活绝对有关的五言古诗《姤妇歌》（1/5下）：

姤妇口舌利，发声愚夫起。巧言皆正理，存心最狠毒（句下小字评：“姤妇多有才，无才必不能恶”）。若见婢妾辈，眉发上倒触。轻则发怒骂，大则加笞箠。甚至施异刑，死生立迫促。夫婿惧威风，微言反受辱。虽死且不避（句下小字评：“真其”），无子心甘足。夫婿惊严命，婢妾日羹羹。膏粱一朝尽，方快其所欲。似此姤妇，愚夫皆可诛灭无属（句下小字评：“快心”）

这首充满怨恨责怒的《姤妇歌》为世人对郑经的私生活提供了一个透视和一个曾未经见的理解角度，值得稍深分析。郑经留给时人和后人最大的诟病和甚至关系明郑政权提早覆亡的指责，便是他的轻率的男女关系。康熙间人的记载，有说他“幼好渔色，多近中年妇人，民妇为经诸弟乳母者，经皆通焉”。^⑨有说他“聘尚书唐显悦长子之妻为妾，端庄静正，而不相得，故外蓄妾童、骚妇为乐”。^⑩亦如众所周知，他因留守厦门时，与四弟裕舍的乳母陈氏（昭娘）私通生子（郑克塽），为唐显悦向初定台湾的郑成功告发，导致郑成功派官驰命往杀郑经及经母董氏，因而触发金厦守将抗命不从，成功悲恨而死的事情。^⑪郑经这件私通乳媪之事至为妻祖告发，一般记述所给的原因是这名由乳母变成郑经的妾侍“怙宠，凌辱[无所出之]经妻唐夫人。夫人怒，使其祖父密白延平”所致。^⑫也有记载这名宠妾生子不久，便“以众嫉死矣”。^⑬至于唐氏，也因郑经“久不见答，郁抑而卒”。^⑭这个关系重大的郑氏伦常家变，一般都是把责任推向郑经方面去。

但这首《姤妇歌》却说出了郑经不相得的原因在于唐氏的极度妒嫉表现。固然这是郑经的一面之词，但无意中却也承认了婢妾众多的事实。郑经这个年轻豪贵嗜好声色，我们可信必有其事，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实在不足为奇。大概退居台湾时，已因为痛经教训，有所收敛了，故此《东壁楼集》中有关声色享受的作品极少。但毕竟还有《欢歌舞》（8/5上）、《咏围碁》（7/5下）之类的诗作，有《喜晴得月》（8/3上）前首“听政余闲学作歌”的偶尔之句；透露了他的嗜好所在。公子情多、沾泥惹絮的后果，使郑经夫妻成为怨偶，原是情理中事。问题在于唐氏无子而又专威，不独对郑经的婢妾晋笞施刑，还要惊动他的父亲，以至“严命”之下，不得保留。看郑经这诗辞气的激烈，唐氏名门大家女的气焰和作风确实辱及郑经。这种父严妻酷的家庭环境，在郑成功死后，必然有所缓和，但郑经的婚姻生活，却不见得改善。据郑克塽所记：唐氏活于崇祯十五年至康熙五年（1642—1666），享年只有二十五岁，生年和郑经一样，随郑经居台二年后才卒。

① 《海纪辑要》，页67。
② 《野史无文》，页171。（郑成功海东事·朱术桂传）。
③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诗钞》（台北：台湾银行，1970；台湾文献丛刊第280种），页1—2，沈光文传；同书同文又见《台湾先贤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页99—100。
④ 《野史无文》，页172—74。（郑成功海东事·陈永华传）。
⑤ 《野史无文》，页177。（向中四隐君子·李茂春传）。
⑥ 《台湾诗苑杂文抄》，页19，郑克塽《先王父墓志》言郑成功“女四，长适柯（语）良”，郑经“女三，……次适柯”。（台湾外记），页309，记谋杀郑克塽事，言郑经母董氏受辱，“令仪宾柯鼎传克塽入内庭议事”。照年辈推测，能与郑经游猎唱和诗歌的，当以他的姐夫或妹夫的柯良的可能性较大。
⑦ 郑经西征的主将为冯锡范和刘国轩。刘为武人，冯则宗军侍卫。（其后？）且为郑克塽外父，与郑经关系密切，故疑“康甫”是他。
⑧ 《东壁楼集》（3/1上）《送林羽官归家》诗云：“细雨风吹乱，问（问？）君欲问津。孤帆入海阔，一剑渡江新。雀噪留人意，鸿飞报客晨。行矣自此始，满酌莫辞频”。其时当在来台不久。
⑨ 郭水河《博海纪游》（台北：台湾银行，1959；台湾文献丛刊第44种），页52。（郑氏逸事·[附]陈烈妇传）。按：（郑氏逸事）原题《伪郑逸事》，陈烈妇即陈永华女、郑克塽妻。
⑩ 《台湾外记》，页159。
⑪ 此事各书详述不同，宜有记载。近者可参看杨云萍《南明研究与台湾文化》（台北板桥市：台湾风物杂志社，1993），页457—64。（郑克塽终于说考）。
⑫ 《野史无文》，页166。（郑成功海东事·郑成功传）。
⑬ 《博海纪游》，页52。（郑氏逸事·[附]陈烈妇传）。
⑭ 《海纪辑要》，页70。

郑经虽还有姬妾数名，但却无续聘继室之事。这样看来，时人说唐氏“郁抑而卒”^①，的确可能，而郑经有曾经沧海的感受，也就同样可能了。

这种国仇未报、真情冷漠而又家庭不睦、知心无人的境况，使得郑经居台的十年期间，生活上和心理上都产生了他原来性格不协的消极倾向，这点在《东壁楼集》众多的诗歌中，得到清楚的反映。他对自己的性情，曾有这样自豪的表述：

《胸臆豁清夜》(4/12下，七律)

雄豪性逸乘天牧，磊落风襟笑斗牛。清腹却同明月转，寸心惟与碧空流。胸杯豁送无际，夜气澄清静不凋。万物包藏肝膈内，俗尘细事等闲抛。

这种亮达豪爽的性情，和康熙时人说他守金厦时“仁慈慷慨，谦恭爱人”^②的表现，是可以互相反映而且自然成理的。年轻的郑经，无疑原本是个风流倜傥的乱世公子，但到了台湾不久，便出现了如下诗篇所述的现象。

《葺山》(2/2上，七古)

飘零云山别乾坤，游客他乡断梦魂。夜阑不寐常独坐，秋雁唳唳月临轩。庭前花竹渐就秀，径边松菊独茂存。中宵碧汉清无际，频听江头海涛喧。愁思不已姑饮酒，倾尽床头五石樽。(总评：“景色无聊”。)

其实何只景色无聊。想有所作为而苦不得出路，乃至夜阑独坐、愁思借酒，才是心情上真正的无聊。

在台湾的十年里，如上所述的各种公私关系上所造成的心志、意气和情感上的抑郁，使郑经表现了一派外表放旷退隐而心里愁闷难排的寻幽远俗和花酒吟赏的行径。《东壁楼集》中有酒、醉、酒醉、醉舞、醉歌舞等字句的诗作，有六十多首，放舟溪壑、杖藜岩石之类的山水游兴之作也很多，山房取静和独坐不眠的题句也时有所见，构成一副不言自白的自我解脱的情景。自然，郑经的好酒好游也是近于天性。这由下面诗章可见大概。

《约游得辰字》(2/22下，七古)

共道山深静无尘，清幽景美尽堪宗。情欢山水频相告，一闻足以动吾神(句下小字评：“古劲”)。夜间梦寐如身往，此心已在水石间。同游须得同志者，好友何必在多人。呼童荷琴并书卷，仆夫秣马驱羊前。载酒携着游玩去，愿言休负此良辰。(总评：“一闻及同游三语，其确，足名千古，亦何必在多言”。)

——此诗气象高华，充满了高贵公子的风流态势，是集中最能正面表达郑经嗜游山水的作品。

问题在于与他真正“同志”此道的“好友”，却不多人，就连这样的高尚雅事，他也免不了素行违众的怀抱。由此推论，他的多时酒醉，也是别有衷肠而非纯因酒致了。他的衷肠里痛的情怀，只能在自然景物和醇酒哀歌中求得遣发，到了最深刻的时份，就只能像在《源水看花入》(2/6上)七言古诗终结所说的“清于耳目今流泉，解吾胸臆今输翠；遨游天地今余生，倾尽醉醪今独醉”了。

由此可见，郑经《东壁楼集·自序》所说他的诗作是因“公事之余，无以自遣，或发于感慨之时，或寄于山水之前，或托于风月之下”而来的，都是高度可以徵信的了。须要指出的是，郑经的政事看来并不繁重；《东壁楼集》中有关民事的诗作，只有关心苦旱、祈求雨水这一主题下的《当轩半落天河水》(3/2上)、《望雨》(4/4上)、《喜雨》二首(4/11上、4/22下)、《闲居即事》(8/3下)、《祈雨未应自罪三章》(8/4上)等各首。最后一题的末首全文如下：

霖霖山雪降灾熉，殃我群黎如此旁。惟望昊天怜万姓，罚愿责在于予躬。(句下小字评：“有商汤自责逸意”。)

表明了郑经并非心不在民。事实上，现代的研究也肯定了他在台湾的政军建设和文教与社会方面

欲

的贡献。^③但祈雨究非日常所需之事，而郑经实多游观觞咏之闲，这却与他在《卜居》诗所说的“~~得庶事称~~，宜先择人居”(1/14上)和《终日无心长自闲》诗所说的“国中庶事分司掌，永日歌吟神自休”(4/5下)那种委政专责的治国作风有关。后期的作品中，有下面这一番自炫自矜和自励自遣之作，可以当郑经政事余暇寄情山水翰墨的原因的结论看。

《写意》(4/25上，七律)

滨海九州化余站，劳心终日不垂帘。致年疾病苍颜现，几岁愁思白发添(句下小字评：“二语悲壮”)。素志休将如火熉，此身岂愿若鱼潜。国中庶事闲余刻，寄意山川秃笔沾。

郑经待时恢复的素志和政余雅事的素行互为始终，贯穿了他第一次撤居台湾的十年光景，只是他的雅事多寓伤怀，真忧多于真乐而已。

结论

本文考证了明郑史料中三百年来曾未与获知见论列的潜苑主人所撰《东壁楼集》为明招讨大将军嗣延平王世子郑经的诗集，而不是被误认的永历帝朱由榔的诗集；集中所载的480首各体诗歌为郑经康熙三年至十三年间第一次撤居台湾时期内的作品；连带析论了传世清抄本《延平二王遗集》中“元之”名下的十二诗歌并非郑经之作或至少并非郑经第一次居台期间之作，从而利用这些真作讨论了郑经十年潜伏居东期间的一贯政治志向和节操、与之相应的政治行动和困境，以及因之而起的情感和行为表现，并且对郑经时代东都明京(今台南市地方)的东壁楼和潜苑这两个建筑的轮廓和所在地作了一些综述和推测。

在其他有关明郑历史的早期记述的配合下，刊于康熙十三年郑经西征初捷进入泉州时的《东壁楼集》全书给我们对郑经的心事和性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居台的十年期间，郑经始终抱着反抗满清恢复明室的志向，他为自己的薄弱处境感到无奈，但从没有放弃过遵养待时的决心，自始至终，他一直以先朝汉臣自处，寓孤忠于已亡的明室，也示节概于新朝的满清。永历朝廷在他的时候已经彻底灭亡，他却至少有数年间把恢复大业的衷心寄托在实际擒灭永历帝父子的清初平西王吴三桂的身上。他以吴三桂为思慕所注的“西方美人”，这是因为吴三桂是当时唯一具有反清成功希望的形势所使然，但同时也是郑经热望著实复明的心志所使然。耿精忠据福州反，远在台湾潜伏十年的郑经便能马上响应入海出征，以弱小的军力登陆争城，这反映了他无惑的勇气，也反映了他长期的独行决心。

但在“直抵闽疆”之前，退居台湾的郑经却没有因满怀澄清恢复的壮志而心情开朗。随来人员与他的素志不符，人情不附，人才流失，言论相乖，加上他自己对明室遗老冷漠态度的普遍不满以及他个人的不美婚姻生活等等，造成了他在精神和心理上的严重孤独和无力感。少有真正慰藉的郑经敢于委政于人，^④但他的忧郁和愤慨，却只能从赋诗饮酒、山水林泉之事得到主要的宣泄。实际上，诗歌的创作却成为了他真正的日常精神寄托。

《东壁楼集》客观地反映了郑经是个好学能文的儒雅之主。这和康熙间人对他的评论是符合的。

① 《郑成功全传》，页211—37。

② 《东壁楼集》内有拟古式爱情诗多首，内容多以思妇体诔征夫、重申思爱为主；亦可反映郑经缺乏而渴望有能体谅其恢复心衷的室人慰藉。例如《因思》(1/2上)：“国中遥相思，寂寞倚三树。忆昔当年时，拳拳获良遇。共枕席未温，又欲装行具。别君意难留，泪落如春雨。挥马从军去，昂昂登前路。妻归空房里，苦情意莫诉。念君在边陲，朝夕其谁顾。身仗王家事，敢思不敢怒(句下小字评：“性情深厚，能识大义”)。望君荣归里，转从如云。须念精悍妻，莫负更新妾。(句下小字评：“又结到本身事上，妙”)。”有关郑经不亲统帅的作风，《海纪辑要》(页65)说他“素不亲政，在东宁则委于参军陈永华，西征时则委于统帅陈锦武、侍卫冯锡范”及归，“乃委监国克塽”。其他各书皆同此意。由《东壁楼集》诗作的内容和数量等处观之，这些记载所言都是得实的。

③ 《台湾外记》，页159。

时人也有说他“为人不务宏远，褊隘器小”，^①也有说他“严毅果敢，弗如厥父之风”。^②这些都是综合他一生的行事而言的，从他遗下的多量诗歌来作印证，可能也是离实不远的。但时人所无法体会或记述不予关注的却是他的坚贞苦志，这也幸而因他的诗歌而得以印证。

〔作者朱鸿林，台湾史语所研究员〕

天花、商贾和白莲教

——嘉靖年间明朝和蒙古的关系

(美)卡尼下·费什

张宪博 译

16世纪的蒙古社会，在杰出的俺答汗的领导下，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公元1507—1582年）。对这些变革，可以做如下概括的描述：在最初的时候，对于蒙古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到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时，他们入侵劫掠了中原。接着，从16世纪40年代中期到1570年，大量的中原移民进入蒙古地区。最后，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起，明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和平贸易的阶段。^①俺答汗在自己整整的一生中，始终试图通过求得必要的粮食和手工业品为他的部民获得经济上的稳定并改变他们的贫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初是通过对明朝北部地区的掠夺，尔后靠那些来自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者，而当这些做法尽归失败后，他们便甘愿成为明朝的臣属了。^②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对北京的进攻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对北京的袭击并不是完全意外的事。那时，蒙古人和中原人已经由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自然地联合起来，长城那边的畜牧业经济和明朝所辖范围内定居的农业社会需要谋求一种相当数额且合法的贸易。在这之前的元朝，农业生产已经取得了很可观的成功，游牧民族与稳定的汉民之间在部分地区的互助，已经通过不受阻碍的贸易所实现。然而，由于明朝的创立者把蒙古人驱逐到长城以外，便导致了这种贸易联系的中断和农耕业的萎缩。继战争之后，蒙古各部首领之间的仇杀又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生产。16世纪的蒙古经济不是自给自足式的，而是一种畜牧业和狩猎业相结合的经济，同时带有一些手工业品的生产。动物和毛皮的过量与粮食和日用品的匮乏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对于亟待发展的特定的蒙古经济来说，和中原的贸易交换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③但是，到嘉靖年间，明朝和土蛮蒙古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存在了。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以后，没有关于朝贡使节的记载。到了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作为促使沿边地区稳定的考虑，明朝政府的方针是反对郅伯是最低限度的贸易开放建议。^④自从16世纪30年代，由于这种贸易交换被禁止，蒙古人被迫发动军事袭击，直入中原，且大有逐渐频繁的趋势。于是，嘉靖朝面临着简单的选择——要么进行贸易，要么抵抗蒙古人的军事入侵。由于多次忽视俺答汗对贸易开放的请求，对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直抵北京城下，嘉靖帝至少应负部分责任。蒙古人采用让中原遭受劫掠这一办法强迫皇帝撤去贸易禁令，从而允许开展一些有限的贸易。然而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开放的马市很快被关闭。马市的厄运来自于明朝政府对游牧人普遍的敌视和不信任的心理。世宗皇帝的优柔寡断以及缺少使他的大臣们相互团结的方针，也都对这些马市的失败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由于明廷的混乱状态，加上皇帝欠缺决断能力，尽管马市最终被批准，但只持续了大约四个

① 《野史元文》，页166，《郑成功海东事·郑成功传》。

② 《台湾外记》，页159。

① 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页132—84。

② 乌云室：《论庚戌之交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③ 杨绍猷：《明代蒙古经济述略》，《民族研究》，1985年第5期。

④ Henry Serruys：《明代的中蒙关系》，页149，布鲁塞耳，1975。